

民族主義與海外華僑

梁子衡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開闊精神，正好解決了我們的疑惑，亦為海外華僑指出一正確的方向，開啓了華僑一條光明燦爛的出路。

過去研究華僑問題常因於華僑定義之辯。吳主惠教授認為：「移住國外的中國人，目前仍與本國保持有機體的聯繫者。」便可稱為華僑。（見吳著《漢民族的研究第七章》）

立法委員丘漢平先生所下的定義是：「所有移居國外的中國人，在未喪失中國國籍者。」

太平洋協會所主編：「法屬支那政治經濟篇」說：「華僑係指『移居國外的中國移民及其子孫。』」（見該篇四一八頁）

南洋協會編：「南洋的華僑」認為：「所謂華僑就是由中國本土移居海外的中國移民及其在居留地長大的子孫（僑生）。」（見該書第二頁）

日本小林新作所下的定義是：「華僑是從中國領土移居外國領土的中國人及其在外國領土居住之子孫，至其國籍如何，可置不問。」（見其所著「中國民族的海外發展」：華僑研究一章之第二頁）

以上所下的定義，基本精神均主張從寬。筆者向認為我國承認雙重國籍，並同意華僑自由選擇國籍，因此對華僑定義從寬而不從嚴，應為各方所接受，且亦吻合我國的僑務政策。

過去研究華僑問題，亦常發生兩種困擾：我們假如站在世界方位來談華僑，鼓勵華僑向「世界走」，常被認為有「數典忘祖」之嫌；假如站在國家方位來談華僑，鼓勵華僑朝「國內走」，則常被認為有「故步自封」之慮。

其二是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我們可以說王道是文化，霸道是武力。王道民族主義亦可稱為文化民族主義。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是創造——以文化來創造；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一特質是融合——以文化達融合；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特質是擴大——以文化成擴大；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特質是大同——以文化進大同。——中國民族能不斷吸收新思想、新血輪、新營養。如吸收佛教之後，便自創新宗派；異於夷亦同於夷，如胡琴、胡床，已成為中國人愛好的器物。

——陸象山說：「東方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西方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但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要以夏變夷，而不可變於夷。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而達到「世界大同」，爲古今聖賢一心嚮往和追求。

許多歷史學家都認爲中國無「國界」，是以文化爲「國界」，文化無「界線」，是以道義爲「界線」，撇開地理上的國界來說，這自是我國文化民族主義的卓越與高超。孫中山先生傳承中國一脈相承的優良傳統文化，採取了西方文化的精華而創作三民主義。我們文化民族主義已兼具中西文化的精神。

孫中山先生解釋民族主義：「何謂民族主義？即民族正義之精神也」、「最高尚之民族主義範圍，則以意志爲依據」、「民族主義是世界大同的基礎」、「民族主義是世界大同的基礎」。中山先生已把民族主義的精神說得非常透切。

三

中華民族從史前到夏、商時代是形成時期；從秦、漢、魏、晉、南北朝，經隋、唐、五代而至宋、元、明、清時代是內部演變和擴充時期；從晚清而至現代是國難與復興時期。

民族史學家羅香林教授認爲中華民族遷徙，形成三支流：

「第一支流稱爲『秦雍流人』。他們原居於今日陝西、甘肅、及山西，後沿漢水流域，順流而下，渡長江而達洞庭湖區；更遠的是，溯湘水轉至桂林，沿西江而入廣東的中部或西部。

第二支流稱爲『司豫流人』。他們原居於今日河南以及河北，後輾轉南遷，而沿汝水繼續南下，渡長江後，分布於江西鄱陽湖區域，或達皖、蘇的中部；或溯江而至粵、贛、閩交界地區。

第三支流稱爲『青徐流人』，他們原居於今日山東，以及江蘇、安徽，後輾轉流徙，而循淮水而下，繼越長江，分布於太湖區域；更遠的，則分布於浙江、福建的沿海；東晉以至宋、齊、梁、陳的中樞人。

中國移民的大船，揚帆於世界汪洋大海中，無遠弗屆，造成海水到處有華僑的景象。我常說中國移民，文化因素是動力，經濟因素是動機，我此一觀點，迄未動搖。

我國移民有若干特性，爲世界移民所無。

在文化方面：由於過去移民以粵、閩同胞爲多。這是嶺南「流人精神」、「充軍精神」所塑造的嶺南文化與西方東來的文化互相激盪的結果。西方文化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嶺南文化衝出了國界，鼓舞中國人向外移殖，成爲中華民族最冒險、最活躍的一群。

在政治方面：由於中國歷史，在朝代交替中，多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局面，在一分一合之中，農村受害較深，國人乃有「安全外求」、「生活外求」的衝動。中國政治，秦以前有上層而無下層；秦以後，唐以前，中國政治開始有上層，亦有中層，而無下層；唐、魏以後才有下層，這時才發生思想上個人的自我創造，自我追求的覺醒。清末以後，中國戰爭，無論在思想上（太平天國），工具上（堅甲利炮），都染上國際關係。滿清專制壓迫，國人反抗力量擴大，而分布於國內外，乃造成「華僑爲革命之母」的一頁光榮歷史，而顯示了海外華僑的政治色彩。

在經濟方面：由於我國初期移民多是三刀（剪刀、剃刀、菜刀）一帶

物，多屬於這一支流的份子。」

以上三支「流人」遷徙的方向，多由北而南，由陸地而沿海。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因文化而動，亦因文化而定；因文化而流散，亦因文化而結聚。這種特性正與我們王道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的精神絲絲入扣，脈絡相通。

四

(腰帶)的移民，故多認為是國人因窮苦而向外走。其實這是一部份的理由。嚴格來說，自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中重商主義一出，造成「富人投資」、「窮人投力」的現象。窮人的「力」便變為商人的「資」，此種人力資源愈廉愈好，在「價廉物美」之下，乃開創了華僑「猪仔」的時代。華僑基於經濟動機而向外移民，披荆斬棘、華路藍縷，由「猪仔」而「店員」、而「小販」、而「商賈」，慢慢的建立一多采多姿，風和日麗的華僑天地。

在社會方面：過去華僑向外移植是「家族世界化」，亦是中國農村的「海外版」。我國過去移民隨帶的物品一是祖宗（神位）、一是生活工具（勞力）、一是信仰（工人帶魯班師、婦女帶觀音、媽祖）、一般社團帶關公）。華僑生活資源向外追求，而精神生活則向內回歸。故華僑社會如放風箏，與祖國長牽一線，永不遠蕩。

今天，海外華僑雖由粵、閩地域性逐漸變為全國性；「勞力移民」亦逐漸變為「知識移民」；「就地生根」的心理逐漸取代「回歸祖國」的心理，因此在這變化急切之間尚缺乏一套華僑社會變化的理論體系和政策構思。

五

我國華僑移植海外，起於何時？頗難稽考，人多認為起於商而盛於唐，故海外稱華僑為「唐人」，而稱華僑聚居的地方為「唐人街」（China Town）。但商以前有無移民？商以後國人出國，何者屬於移民？何者屬於遊旅？何者屬於行商？何者屬於使臣？實難分別。可是，我國移民在我們王道民族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的背景下，所表現的完全是和平相處、文化溝通、互濟互助的行動。

在美、歐，華僑由勞力的貢獻進到服務性經濟的配合，只有「生活要求」、「安全要求」，而絕沒有「政治要求」、「權力要求」，在僑居地國家受侵略或天災人禍時，華僑亦只有犧牲奉獻，拔刀相助。

在中國傳統文化陶冶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君子不念舊惡」的美德，會引起歐、美人士廣泛的讚揚，而引發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興趣。

亞洲如日、韓與我中國的文化關係密切。華僑移植日、韓，文化、政治、地緣的關係重於經濟的關係。如菲律賓、泰國、越南、高棉、寮國、印尼、印度、緬甸、新加坡、馬來亞等地與我國，有「遠親不如近鄰」的地緣意義。

論文化，越南的衣冠文物幾全為漢化，越南堤岸有「孔子道」、「老子街」；論政治，舉國父在民族主義第四講所說為例。國父說：「我有一次在暹羅的外交部和外交次長談話，所談的是東亞問題，那位外交次長說：『如果中國的革命變成國富民強，我們暹羅情願還是歸還中國，做中國的一行省。』」

我們都知道，東南亞各地曾長期受其宗主國的統制、剝削和迫害，帝國主義與當地文化的衝突，賴中國文化為其調和；帝國主義與當地經濟的竞争，賴華僑經濟為之折衷；帝國主義與當地政治的磨擦，賴華僑力量為之化解。相反的，假如華僑採取侵略奪取的態度，東南亞的情況則非今日的現象了。

再進一步來說，西方民族主義運動始於一七七六年，美國脫離英國的統治；東方民族主義運動則較落於西方之後，而海外華僑和中國革命對東南亞民族獨立均發生了鼓舞的作用及提供了直接或間接的支援。

華僑史發展到現在，海外華僑面臨各種的挑戰，應有一番作為，創造一個新的局面了。

六

我們要把民族主義與海外華僑關連起來，就得充份了解我們王道和文化民族主義的幾個明顯意義：

——王道民族主義是和平而非鬥爭的。上面已引證先總統蔣公的講話，

我們民族融合的動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這裡再引國父在民族主義第六講說：「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

——文化民族主義是以文化來推展關係，建立感情，以天下為己任，來達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不單是在理論和實行上有其連環性，而在空間上也有其連環性。

胡展堂漢民先生在其大著「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一書說：「實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實行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實行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這是指理論和實行上的連環性。

國父在「欲改造新國家，當實行三民主義」中說：「世界人類各族平等，一種族不爲他種族所壓制。」這種一視同仁的態度很明顯的是指空間的連環性。

民族主義結合了中國傳統文化天下爲公、世界大同的抱負，使民族主義成爲世界主義的基石；使世界主義成爲民族主義的發展。正提供了華僑今後努力的指標。

王充思想體系

陳叔良 著

定價九〇元

群玉論語文集

田倩君 著

定價一一七元

治史經驗談

嚴耕望 著

定價四五元

王充爲我國中古時代最具震撼力之偉大思想家，影響深遠。本書有系統地闡述王充之時代、身世及思想淵源，並就其人性論、知識論等多方引證，詳加剖析，最後就歷史懸疑問題作精闢之論斷。附錄所載「論衡」版本及有關論著書目，尤多參考價值。

論孟虛字集釋

倪志佩 著

定價一八九元

虛字抽象難明，變化多端，在文章中爲表情之工具，對文體有彌縫輔助之功。本書所選自論孟二書中虛字二百餘字，通常應用者已略具備。著者以現代語法知識，說明其各種用法、變化，隨文疏解，以供研讀古文讀者理解文義，改正寫作錯誤之用。

本書所收論文計二十二篇，約二十餘萬言，以商朝爲重心，描寫上古社會之形態，如文化、生活之發展以及社會經濟，國家體制等。也即爲商朝文化之前因及其對後世之影響。由本書得窺先民社會生活之一般。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本書爲作者就其四十餘年研究中國歷史的實際經驗談，以供青年史學工作者參考。全書分爲九篇，內容涉及基本方法、具體規律、論題選擇、論著標準及論文寫作諸問題，最後二篇作者認爲係求取學術成就的最基本功夫。